

旨”的《辽文汇》，后增订为《全辽文》。^①

相较于近乎“述而不作”的《辽文汇》，《辽史补注》更能体现陈述在史学上善于接力、后来居上的治学特点。1933年，陈述初谒陈寅恪于姚家胡同，得陈氏指点，“以唐、宋、辽、金、元为主，不敢多读汉唐以前书。在此千年诸史之中，尤以《辽史》记载最阙漏，遂以厉、杨之书附《辽史》，并以五代、宋、元诸史及《册府》、会要、碑志、杂记补其阙，参取钱大昕《考异》、陈汉章《索隐》汇集一编”。^②所谓“厉、杨之书”指的是厉鹗的《辽史拾遗》和杨复吉的《辽史拾遗补》。这便是陈述撰《辽史补注》的动机与做法。陈寅恪对《辽史补注》予以高度赞誉，谓“《补注》之于《辽史》，亦将如裴注之附陈志，并重于学术之林”，^③陈寅恪看重的是《辽史补注》在史料辑录上的价值。所谓“补注”，按照陈述的说法，“补者效褚少孙之补《史记》，注者效裴松之之注《三国》。广征后魏以来诸史、文集、笔记，包括钱大昕、厉鹗诸家所考订及晚近出土资料和研究成绩，全面网罗，证其合否，一一补入《辽史》。考证之学，譬如积薪，现在的工作，即就前人所积者，接力积累，对《辽史》作全面增补订正”。^④陈述继承了褚少孙、裴松之补注正史的传统，又在钱大昕、厉鹗诸儒的基础上，对《辽史》正误、补阙、补歧异、存类事，^⑤引用书目在800种以上，^⑥真正做到了“接力积累”，将《辽史》整理与辽史研究推向了新高度。

传统遇见近代，是一个时代命题。一个多世纪以来，复古倒退者早已被历史无情淘汰。而那些曾经誓要抛弃传统的激进者们，也未能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彻底告别传统。优良传统和学术遗产在经历一段隐逸的行程后，渐显由边缘回归之势。对抗、超越与赓续、演化是可能而且必然共存的，政治、文化、思想、学术莫不如此。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与传统完全断裂、毫无关联的思想与学术。

近代历史编纂新格局与传统文化应变力*

刘永祥（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）

伴随中国近代社会和史学的变迁，历史编纂学也迎来一场体系性革新，从编纂旨趣到理论体系、从承载内容到表现形式等，都展露出明显异于传统的新特点。近代历史编纂领域形成的新格局，与西学传播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，因此，有的学者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对西方史学的移植和对传统史学的摒弃，似乎在传统和近代历史编纂学之间形成了一个断层。这是不符合事实的，也有违中国史学、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：“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，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。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，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，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，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。”^①这段话具有深刻的理论指导意义，提示我们在考察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时，不能只看到对外来文化的吸收，更要看到对本

① 以上参见陈述：《辽文汇》，中国科学院1953年版，“序例”，第1—2页。

② 陈述：《辽史补注》，中华书局2018年版，“后记”，第3773页。

③ 陈寅恪：《陈述辽史补注序》，陈寅恪：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，第235页。

④ 陈述：《辽史补注》，“自序”，第9页。

⑤ 参见陈述：《辽史补注》，“序例”，第14—23页。

⑥ 陈重：《陈述先生遗稿举要》，宋德金等编：《辽金西夏史研究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240页。

* 本文是国家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重大学术文化工程《（新编）中国通史》纂修工程“中国史学史卷”的阶段性成果。

① 《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》，《人民日报》2023年6月3日。

土文化的自觉传承。抽丝剥茧后会发现,中国的史学和文化传统在历史编纂学的近代转型过程中,始终发挥着塑造作用,表现出明显的连续性。对此加以深入考察,有利于对历史编纂学的近代转型形成更全面的认识,也能从侧面展现传统文化面对西学冲击时的应变力。学界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通史家风、公羊历史哲学和民本思想的影响,本文拟从其他几个层面,探究传统元素在历史编纂学近代转型过程中发挥的具体作用,以期推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。

一、史学传统视角下对近代官方修史的再审视

在现代化语境之下,传统史学常常以被批判者的形象出现。这是因为,在经历过东西方“文野转换”的心路历程后,传统与野蛮、落后具有了语义上的一致性。尤其是当君主专制的政治合法性出现危机后,与此紧密联系的文化危机就必然会形成。在诸多传承千余年的史学传统中,高度政治化的官方修史就承受了最猛烈的炮火,被批得体无完肤。从史学思想视角看,晚清官方修史确实落后于时代,未能跳出旧有框架;但从历史编纂学视角看,其在“存史”方面的成绩不应被一笔抹杀。

实际上,中西方史学各有所长。中国古代史学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历史编纂领域,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体系、连续而准确的历史记载、数量浩繁的历史典籍,以及形式多样的体裁体例。梁启超早年曾宣称“中国无史”,但那是史学服务于政治的攻击策略,态度难免偏激。五四以后,他在撰写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时,就站在相对客观的学术立场评价中国史学的世界地位。他说:“史学在世界各国中,惟中国为最发达。”^①此一世界地位的获得,显然离不开持续、宏大而严密的官方修史体系。尽管西方史家经常对中国古代历史编纂服务于王朝政治的“资治”属性展开批评,中国古代官方修史也确实存在严重弊端,但修史的制度化使中国在“存史”方面可以傲视群雄,这是毫无疑问的。历史记载是历史学的基础,所谓历史意识,首先是保存历史,然后才能衍生出考证、批判、资治等其他含义。因此,对于晚清官方修史的评价,不能只站在西方近代史学的标准之下,还应着眼于中国史学传统的延续这一视角。

清入关之前表现出对官方修史的高度重视,入关后又继承了前代官方修史的经验,制定出一套更为严密的修史制度,将官方修史推进到新的阶段。尤其是特开史馆的灵活性,让清代官方修史表现出特殊的活力。道光以后,特开史馆明显萎缩,修史数量也难与乾嘉时期相媲美。这主要是因为,不断加剧的社会危机和殖民危机使清廷陷于内忧外患之中,已无法保持“盛世”时对史馆的财政供给。即便在这种情况下,官方修史仍维持了相当规模,编纂的成绩也可圈可点。有学者曾统计这一时期完成的史书种类:“从宣宗到德宗的四朝实录 1803 卷、圣训 545 卷,太祖至文宗圣训 762 卷,清会典、会典图、会典事例 1590 卷,各部院则例 40 种 1433 卷册,志、案、录 13 种 1022 卷册,玉牒 1 种 6 卷,方略 8 种 1410 卷,国史馆写定稿本包括本纪、志、传、表和皇清奏议 5686 卷册,清一统志(道光 22 年修成)560 卷,道光至宣统二年起居注千余册。”^②这说明,官方修史仍是晚清政治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,绝非可有可无。其于艰难处境中仍在“存史”方面取得可观成绩,恰恰证明清廷对修史传统的重视。而且,这一时期编纂的史书虽有诸多缺陷,但为后世保存了大量史料,理应在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

晚清官方修史的资治功能也并未丧失,而是努力进行自我调适以应对新的危机,主要表现在两

① 梁启超: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,梁启超:《饮冰室合集》专集之七十三,中华书局 1989 年版,第 9 页。

② 高国抗、杨燕起主编:《中国近代史学史概要》,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,第 60 页。

个方面:一是则例编纂的改革凸显致用思想,^①二是中外交涉历史编纂的创设,如《筹办夷务始末》《各国政艺通考》等。这一新类型的出现,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官方修史传统的突破,应当被视为晚清官方修史面对新的世界形势作出的主动求变。以编纂质量而论,《筹办夷务始末》更胜一筹。它的编纂是以清廷藩贡外交体系被打破、被迫融入世界新秩序为背景,与涉外事务不断扩大的现实境况相适应。编纂者多身居要职、官职显赫,反映出清廷对此项编纂的重视。该书虽在编纂之初仍具有突出的天朝上国和华夏中心意识,对外国一律称“夷”,但这一思想倾向在编纂同治朝《始末》时发生了重要变化。编纂者开始正视和承认中西之间存在的差距,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,并盛赞洋务运动。而且,道光朝《始末》的起始时间定于1836年(非道光帝即位),将有关鸦片问题的史料置于篇首,也能体现出编纂者的卓识。蒋廷黻评论称:“此书何以从道光十六年起始,编辑的人并未说明,不过起始两篇都有关于鸦片问题,亦可见编辑者对于‘夷务’的观察。”^②此外,光绪年间纂修《大清会典》亦呈现一些新的时代特点。比如,为保证图例的准确性,各省进行大规模的勘察测量,以重新绘制舆图,而这项工作“非平日留心舆地、谙悉中西算法之人,不能措手”,^③因此,会典馆从同文馆、水师学堂、广方言馆等新式学堂中调取教习、学生等。这些接受了新式教育的人才对官方修史的参与,在一定程度上将西方近代科学理念和方法带入了史馆。

总之,对于晚清时期的官方修史活动,不能一味站在现代史学角度定位为“衰落”而忽略其在“存史”方面取得的成绩,以及其面对新形势所做出的主动求变与突破。客观而言,作为政治文化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官方修史,真正走向没落是在清朝灭亡、君主专制终结之后。其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大为减弱,遂被以大学为依托的近代史学新体系彻底抢走主流地位。民国初年,围绕是否设立国史馆展开的激烈争论,一方面说明新的政治和史学观念已然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同,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在提及官方修史时的确更多地关注其政治属性。不论是袁世凯将设立清史馆视为恢复帝制、拉拢“遗老”的一环,抑或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对国史馆政治立场的强化,民国时期的官方修史似乎已变为多方政治力量的博弈场。但我们仍应看到事情的另一面——尽管清史馆和国史馆的发展历经曲折,史馆建制和运作都无法与传统官方修史相媲美,但设馆修史的传统毕竟延续了下来,并且不是作为单纯的政治符号,而是彰显出中华民族重视修史的文化传统的强大生命力。《清史稿》的纂成和国史馆在纂辑史料方面取得的成绩,都不应被忽视。许多政治家和学者都在如何弘扬优良传统和体现新的时代特征方面,提出了诸多具有卓识的主张,也为史料的保存和整理付出了极大努力。^④

二、经世致用:近代历史编纂新格局形成的核心动力

除官方修史外,近代历史编纂最先呈现的新格局,主要表现在边疆史、外国史和当代史编纂的兴起,亦即完成“三大转向”:由内地转向边疆、由中国转向世界、由古代转向当代。齐思和曾谓:“道光以来,学术的新风气是谈富强、讲经世……在史学方面,由考订校勘转而趋于研求本朝的掌故,讲求边疆地理(特别是西北史地)以谋筹边,研究外国史以谋对外。”^⑤西方入侵带来士人世界观念的重

① 参见舒习龙:《晚清则例纂修特点与政治变迁》,《兰州学刊》2015年第8期。

② 蒋廷黻:《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之史料的价值》,《清华周刊》第37卷第9—10期合刊,1932年5月。

③ 朱寿朋编:《光绪朝东华录》,张静庐等校点,中华书局1958年版,第3252页。

④ 参见刘永祥:《民国时期国史馆的变迁》,《学术研究》2015年第2期。

⑤ 齐思和:《晚清史学的发展》,齐思和:《中国史探研》,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,第662页。

建,是发生上述转向的重要原因。而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考察,一以贯之的经世致用思想则是新格局形成的核心动力。

在中西方史学体系里,经世致用思想都占有重要地位。前者的政治属性和实用意味显然更浓厚,后者则因私家修史占据主导而主要表现为文化属性。作为一项文化传统,经世致用思想在中国历史演进中始终发挥作用,只是内涵和形式并不固定。相较于乾嘉时期将经世致用思想隐含于历史考证之中,道咸时期的史学经世表现得更直接,对内形成“考史”“著史”并行之势,对外则实现从“通经致用”向“通史致用”的转变,兴起的标志即为边疆史编纂热潮的出现。外患的日益严重与清廷的自我封闭,促使晚清边疆史编纂者将学术视野扩展到外国,同时对本朝过往进行深刻反思,从而带来外国史和当代史编纂的新潮流。而且,他们开始突破传统华夷之辨的藩篱,发出了解外国甚至向外国学习的呼声。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,是在编纂外国史过程中,大量参考、引用外国人所著书籍。这些新变化的产生自然离不开外力的刺激,但内在的推动力更具根本性。这一时期经世致用被赋予新的思想内涵,表现为突破六经所规范的治国范畴及倡导兼容并包的学术风气,实已呈现接纳西学的趋向。^①这说明,近代历史编纂新格局的形成,并非完全由西学东渐所驱动,而有其自身内在的演进逻辑。此后历史编纂学的基本走向,也不是跟西方亦步亦趋,而是随着中国对西方理解的深入,不断根据自身发展的现实需求做出调整。换言之,经世目标的变化决定着历史编纂呈现出何种面貌。

近代历史编纂的第二次高峰和转折,出现在甲午战败以后。经此一役,经世致用的目标超越了重新认识世界及器物救国的层面,跨入带有整体性的文明层面,试图通过全方位的改革实现国家崛起,以克服异常严峻的亡国危机,并让中国步入世界文明之列。与此相适应,历史编纂呈现新的面貌。一方面,外国史编纂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史地知识介绍,而是将目光聚焦到西方国家的整体盛衰上,侧重革命史和亡国史编纂,如美国独立史、法国革命史和波兰亡国史、朝鲜亡国史等是当时传播度最广的外国史。^②所谓“处将亡之势,而不自知其所以亡者,则与其读建国史,不如读亡国史”,^③即道出了时人编纂亡国史的根本动机。另一方面,以文明史学为蓝本的“新史学”理念被系统贯彻到新型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中,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重写中国史浪潮,为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体系中争得应有位置及最终崛起而服务。清末新史家一面以日本为中介引入西方文明史学来重写中国史,一面又对其中所包含的“中国停滞论”展开严厉批评。事实上,“新史学”首先应当被视为对传统历史编纂体系的批判与重建,梁启超《中国史叙论》《新史学》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等皆旨在“说明一部通史应如何作法”。^④只有从这一视角观察,我们才能发现当时史学革命之有的放矢与真正意义,即:推倒以专制王朝为中心的历史编纂体系,建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编纂体系。

近代历史编纂的第三次高峰和转折,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,其背后同样是经世致用思想的推动。与民国初期史学的学科化和专门化相适应,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历史编纂学呈现通史编纂继续发展、专史编纂异军突起的基本格局。梁启超明言:“今日所需之史,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。”^⑤各类贯通性的专史编纂如学术史、民族史、宗教史、文化史、制度史、政治史等层出不穷,从不同角度再现客观历史进程,使历史编纂的内容获得极大丰富,实际上已取代通史编纂的主流地位。吕思勉、何

① 参见陈其泰、刘兰肖:《晚清社会危机中的学术转向——魏源对“经世之学”义理的阐发》,《求索》2004年第1期。

② 参见邹振环:《清末亡国史“编译热”与梁启超的朝鲜亡国史研究》,《韩国研究论丛》第2辑,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。

③ 《绍介新著:埃及近世史》,《新民丛报》第6号,1902年3月。

④ 梁启超: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,梁启超:《饮冰室合集》专集之九十九,“绪论”,第1页。

⑤ 梁启超: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,梁启超:《饮冰室合集》专集之七十三,第35页。

炳松、陈训慈等不少史家都围绕专史和通史之间的关系提出独立见解,大多强调专史研究和编纂的基础作用,如谓“现在史学的发达,实得力于各种专门史的竞出。各种专门史日益进步,而普通史乃亦随之而进步”,^①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当时的学风是以历史研究为主导,而非历史编纂。这一学术状态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而被迅速扭转,“书生何以报国”成为摆在每一个知识分子面前的重大命题。经世致用也有了新的内涵,表现为强化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,推进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进程。中国史学遂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合流趋势,无论是推崇历史考证者,还是推崇历史解释者,纷纷将视野聚焦到经世致用层面,主张通过传播历史知识来增强国人的民族文化认同、指明未来应走之路。历史编纂再度成为时代潮流,不仅产生了大量各具特色、形式多样的高质量通史(皆以民族主义为编纂主旨),而且促成了通俗历史编纂的热潮。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,是新历史考证学派代表顾颉刚将诸多通史编纂构想付诸于实践。^②

可见,近代历史编纂新格局的形成和阶段性变化,是与史学、政治和社会的整体转型相适应的,而在外部刺激的表象之下,尚隐藏着经世致用这一内在动力。如果只讲西学冲击,忽略本土的经世需求,恐怕很难对上述变化作出完整的概括和解释。

三、结构·文字:历史编纂审美传统的延续

20世纪初“新史学”旗帜树立起来以后,各家对于科学的理解虽然存在差别,但实现史学科学化几乎成为所有现代史家的目标,中国史学的主体也由历史编纂渐次转变为历史研究。时人谓:“今日中国的历史学是一个论文写作或专题研究的时代。”^③相应地,如果将叙事视为传统史学的主要特征之一,那么,近代史学的发展方向则显然是对叙事的疏离。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史学专题化、以史料审查为依据的史学精细化、以哲学探索为目标的史学规律化、以学科互涉为方法的史学多元化等学术规范的形成,不仅昭示着这一趋向,而且使得近代历史叙事在整体风格上与传统历史叙事大相径庭。但是,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历史编纂的审美传统就此中断,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延续,从而使近代历史编纂学彰显出浓厚的民族风格。

无论中国还是西方,审美历来都是史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古代史家也很早就对此展开专门论述,古希腊卢奇安的《论撰史》和南朝刘勰的《文心雕龙·史传》先后提出相近看法,认为史学之美大致应包含真实之美、结构之美和文字之美。如果说在“求真”方面双方不相上下的话,中国史家对史书结构和文字表述显然更为重视,不论是理论探索还是编纂实践都自成体系、一脉相承,常被视为中国史学的一大特色。^④其中,又以体裁体例的继承与创新最为突出。以往学界常将近代以来的史书体裁简单归结为西方章节体的流行,而忽略了史书中包含的本土特点。其一,很多史家认为西方的章节体与中国的纪事本末体之间并无本质区别。王舟瑶就明确说:“今之西史,大都纪事本末体也。”^⑤因此,最初编纂的诸多通史或断代史都带有突出的纪事本末风格。其二,史家虽在主体上采用了章节体,但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把中国传统的体裁体例灵活地融入其中。比如,萧一山编纂的《清

① 吕思勉:《历史研究法》,吕思勉:《史学与史籍七种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,第15页。

② 参见刘永祥:《“疑古”之外的学术追求——顾颉刚的通史编纂构想与实践》,《淮阴师范学院学报》2016年第2期。

③ 贺昌群:《哀张荫麟先生》,《理想与文化》第2期,1942年。

④ 参见瞿林东:《史学与艺术》,《安徽师范大学学报》2001年第4期。

⑤ 王舟瑶:《京师大学堂中国通史讲义》,《京师大学堂历史讲义合刊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,第60页。

代通史》是章节体首次在大型史书编纂中的成功运用,但他同时又广泛吸收了传统体裁的优点,不仅在史表运用方面独具匠心,而且在体例上亦显示出娴熟的作史技巧。^①其三,以整合、兼顾不同体裁优点为旨归的“新综合体”蓬勃发展,如纪事本末体与纪传体、纪事本末体与典制体的融合等。晚清《海国图志》《元史新编》《法国志略》等,都曾在传统体裁之间进行整合。此后,梁启超、章太炎、金毓黻、卫聚贤、吕思勉等诸多史家,也曾进行大胆尝试。

至于历来被视作良史重要标准的“善序事”“资文采”传统,近代以来在史学科学化大潮下确有着被边缘化的趋势,无法与历史事实的考证和历史规律的总结相媲美,史学与文学之间的边界也逐渐由模糊变得清晰。严复曾谓:“我们中国论史,多尚文章故实,此实犯玩物丧志之弊……故当前说出时,或谓以历史为科学材料者,文章之美,必不及前,而纪述无文,即难行远云云。然此皆明于一方之论,不知史之可贵,在前事为后事之师。是故读史有术,在求因果,在能即异见同,抽出公例。”^②吕思勉则指出:“史学和文学,系属两事。文学系空想的,主于感情;史学系事实的,主于理智。所以在人类思想未甚进步,主客观的分别不甚严密的时代,史学和文学的关系,总是很密切的,到客观观念渐次明了时,情形就不同了。”^③不过,从历史编纂学的视角来看,文字表述仍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,会直接影响史书的编纂质量。梁启超在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中重论史家四长时,就专门谈到文字表述问题,他认为:一要简洁,即“文章以说话少,含意多为最妙”;二要飞动,即“历史的文章,为的是作给人看,若不能感动人,其价值就减少了”。^④陆懋德也认为“善作史者,固可一方面能保存其事实,而在另一方面又能不失去其兴趣。如是既使历史可为科学的,而同时又可为美术的”,明确主张“历史的著作实需要高等文学”,史家为文应做到“举重若轻,词浅义深,方显出‘大手笔’之能事”。^⑤金毓黻同样指出,不具有深厚文学素养的人难以做成良史,“史文翔实高简,非大手笔不能为……文以载事为职,事必资文以传,二者相需甚殷,不可偏废”。在文字表述要求上,他则总结为:“一曰雅而能健,二曰举重若轻,三曰无格格不吐之病。”^⑥

不管是历史研究还是历史编纂,最终都需要通过文字来表达,两者在准确性这一点上并无二致。20世纪以来的通史、断代史和专史编纂,基本都不再秉持“寓论断于叙事”的传统,而采取夹叙夹议的写作风格,也常常将考证过程置于叙事中。差别主要在于,历史表述该不该讲究文采,通过生动的文字来增强感染力,以引发读者的共鸣。上升到更广泛的理论层面,即为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性质之争。在这一问题上,立场最为明确、贡献最大的是张荫麟。他先后撰写了多篇文章,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主张,旗帜鲜明地反对单纯将史学视为科学,而忽略其艺术性的一面,认为史学既是科学,也是艺术。他主要援引西学来阐明上述观点,但也有对中国史学美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,尤其高度评价了章学诚的史学艺术论。^⑦他将史学之美的追求贯彻到历史编纂实践中,完成了一部广受赞誉的《中国史纲》,既践行了“史学是艺术”的宣言,也让章学诚所谓“圆而神”、梁启超想望的“活的历史”成为现实,堪称开创了通史编纂的新范式。

① 参见陈其泰、张爱芳:《现代史家对史表的成功运用——以萧一山〈清代通史〉为例》,《人文杂志》2013年第11期。

② 严复:《政治讲义》,王栻主编:《严复集》,中华书局1986年版,第1243页。

③ 吕思勉:《历史研究法》,吕思勉:《史学与史籍七种》,第16页。

④ 梁启超: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,梁启超:《饮冰室合集》专集之九十九,第27页。

⑤ 陆懋德:《史学方法大纲》,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资料室1980年版,第110—112页。

⑥ 金毓黻:《静晤室日记》,辽沈书社1993年版,第41、6493页。

⑦ 参见徐国利:《张荫麟的史学艺术论及其思想来源与特征》,《南开学报》2021年第1期。

历史编纂学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,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变化都会在历史编纂学中体现出来,并且往往以通史编纂为载体。比如,20世纪初兴起的“国史重写”运动,几乎都贯彻了“新史学”理念——以进化史观为理论指导、以民族国家为叙述范围、以民史取代君史等。在接受西方史学观念过程中,公羊历史哲学、传统民本思想等也都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,这同时又是中国史学特有的“通史家风”的传承。综上可知,近代历史编纂学新格局的形成并非简单的模仿西方,而是中西方史学理论和文化观念相互融合的结果,无论是官方修史的延续,还是通史和断代史的编纂,都带有浓厚的本土特色。中国史学的主体性,也并没有因为吸收外来文化而丢失。恰恰相反,随着中国史学近代化程度的加深,中国史家越来越强调中国史学的主体性,对争夺史学话语权抱有充分的自觉,并努力构建带有中国特色的史学话语体系。

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个缩影

——以“浙东学派”概念的构建为中心

童 杰 (浙江省哲社重点研究基地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教授)

“浙东学派”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初,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,关于其命名、性质、内涵及定义的研讨从未中断。清末,梁启超最早揭橥了近代学术意义上的“浙东学派”概念。^①民国时期,又有章太炎、傅斯年、陈训慈、姚名达、周予同、张其昀、刘咸炘、何炳松、邓广铭、蒙文通、宋念慈、张寿镛、钱穆、李源澄、金毓黻等著名学人先后论及“浙东学派”。^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,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持续深化了对“浙东学派”的研究。纵观“浙东学派”百年学术研究,一方面成果斐然,粲然可观;另一方面,“浙东学派”研究史本身的积淀也殊为丰厚,作为学术史与史学史研究的对象,具备了多维的学术意义与价值。中国近代史学呈现复杂多样化的状态,中西史学碰撞、新旧学问争锋,彼此相互渗透、磨合,在缤纷融合中完成了近代化。“浙东学派”是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后建构的一个概念,同时,因为“浙东学派”承载了诸多传统史学的学理与内涵,抱持不同治学取向的民国学者通过对“浙东学派”的研究来表达各自的学术主张——新文化的拥趸者希望以“浙东学派”为理,沟通中西,改造文明;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试图以“浙东学派”为名,钩沉绝学,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出路。无论贬斥抑或表彰、谬误抑或精准,各派学者的尝试与努力在客观上都促进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转型。

① 1904年9、10、12月,梁启超在《新民丛报》(半月刊)陆续刊载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的第七章“近世之学术(起明亡以迄近日)”,最早提出“浙东学派”的概念。

② 民国时期,关于“浙东学派”的研讨先后出现在章太炎《菴书·清儒》(《章太炎全集》第3册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)、傅斯年《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》(《新潮》第1卷第4号,1919年4月)、陈训慈《浙东史学管窥》(《史学》创刊号,1930年12月)、《清代浙东之史学》(《史学杂志》第2卷第5—6期合刊,1931年4月)、姚名达《章实斋之史学》(《国学日报:述学社刊物之一》第2卷第1期,1927年1月;第2卷第2期,1927年2月)、周予同《第四期之前夜》(《一般》第6卷第1—4号,1929年1月)、张其昀《宋代四明之学风》(上、下)(《史学杂志》第1卷第3期,1929年7月;第4期,1929年9月)、刘咸炘《先河录》(刘咸炘:《推广书》,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版)、何炳松《浙东学派溯源》(岳麓书社2011年版)、邓广铭《浙东学派探源——兼评何炳松〈浙东学派溯源〉》(《益世报》(天津版)1935年8月29日)、蒙文通《评〈学史散篇〉》(致柳翼谋谄徵先生书)《跋华阳张君〈叶水心研究〉》(蒙文通:《中国史学史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)、宋念慈《渊源流长之浙东史学派》(《浙江青年》第2卷第6期,1936年4月)、张寿镛《宋元学案补遗序录》(张寿镛辑:《四明丛书》第5集,广陵书社2006年版)、钱穆《近三百年学术史》(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)、李源澄《浙东史学之远源》(《史地杂志》第1卷第3期上册,1940年9月)、金毓黻《中国史学史》(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)等著名学人的论著中。